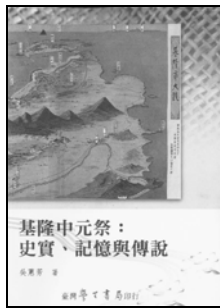


評介吳蕙芳著《基隆中元祭： 史實、記憶與傳說》

鄭螢憶*



書名：基隆中元祭：史實、記憶與傳說
作者：吳蕙芳
出版社：臺灣學生書局
出版時間：2013 年 9 月
頁數：477 頁

一、前言

寺廟作為傳統臺灣地方社會人群活動的重要場域，吸引不少臺灣史研究者關注，藉以研究廟會活動、風俗節慶，理解其背後祭祀空間、人群動員與地方社會網絡關係。目前學界對此研究途徑已有豐厚的學術積累，從日治時期岡田謙以來的祭祀圈、信仰圈研究，乃至 2002 年張珣所提出後祭祀圈研究。¹ 此外，康豹（Paul R. Katz）自 1990 年代另闢研究途徑，利用公共領域（public sphere）、象徵資本（symbolic capital）或權力的文化網絡（culture nexus of power）等概念，

*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

來稿日期：2014 年 1 月 14 日；通過刊登：2014 年 5 月 9 日。

¹ 岡田謙，〈臺灣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圈〉，《民族學研究》4: 1（1938 年 1 月），頁 1-22；林美蓉，〈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62（1986 年秋季號），頁 53-114；張珣，〈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》58（2002 年 6 月），頁 78-111。

研究地方菁英參與宗教活動的動力問題。² 2010年謝國興提出「交陪境」概念與祭祀圈、信仰圈理論對話。³

本書作者吳蕙芳教授，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，任職於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，著有《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》、《萬寶全書：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》等多本論著。本書為其長年研究基隆地方社會與中元祭的重要成果，也是地方史研究中關於宗教信仰與其組織的歷史研究。⁴ 但作者並未將此個案研究，置於前述研究脈絡，反是另闢蹊徑援引「公共歷史學」(Public History)作為本書核心概念，足見其突破既有地方民間信仰研究取徑的企圖。作者認為戰後所形塑的基隆中元祭圖像，是經過學院內外、不同背景學科者一再強調、突顯與複製，成為一般民眾廣泛接受、認知而流傳的內容，此現象可視為公共歷史學課題，亦為本書重要的問題意識。

二、內容介紹

全書共分為八章，除第一章、第八章為緒論、結論外，計分為兩部，第一部「戰後的記憶、傳說與運作」(二、三章)、第二部「歷史事實的追溯與建構」(四、五、六、七章)。在史料運用方面，不僅涵蓋清代奏摺、地方志書，日治時期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等官方檔案，也引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新高新報》、《臺灣民報》、《南瀛佛教》等報紙期刊及日人調查紀錄、宗教調查資料，並配合地方碑刻、契約文書、宗親會資料等民間文獻，實為本書的特點之一。而作者在緒論中也說明中元節慶在臺灣全島發展之概況，並詳細耙梳基隆地方史、中元祭相關研究，並指陳人文學者、社會科學研究者或歷史學者對於「基隆中元祭課題探討之異同？」、「造成何等影響？」等疑問與研究多集中在戰後，較少關注日治、清領時期的觀察。

² Paul R. Katz (康豹)，〈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〉，《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》53 (1997年6月)，頁71-78；康豹，〈新莊地藏庵的大眾爺崇拜〉，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》16 (1997年12月)，頁123-159。

³ 謝國興，〈南瀛地區廟會的繞境模式：兼論祭祀圈、信仰圈與交陪境〉，收於戴文鋒主編，《南瀛歷史、社會與文化II》(臺南：臺南縣政府，2010)，頁235-254。

⁴ 本書第一章第二節、第二～七章皆以期刊、會議論文形式發表於重要學術期刊。

第二章〈基隆中元祭的圖像：從官方到民間〉指出中元祭的圖像，乃是在民國六〇、七〇年代，以舊版重修本《基隆市志》為基礎，加上宗親會報告書、老大宮廟碑刻等形塑而成，將咸豐年間漳泉械鬥、姓氏輪值主普制度相連結，形成中元祭具有「賽陣頭代替打破頭」、「血緣關係化解地域衝突」之論述，再透過官方、民間出版品不斷地被複製與傳布。

第三章〈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：以黃姓宗親會為例〉說明黃姓宗親會是在1920年代全臺修譜建祠的風氣下成立，創會後不僅參與水燈、花車等陣頭遊行，也負責三大柱主壇工作，甚至在戰後成為第14輪值主普姓氏。從其2次輪值主普活動觀察，作者認為中元祭主普活動體現黃姓在基隆地區血緣、地緣、業緣的網絡關係。

第四章〈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：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〉考訂姓氏輪值主普制度是在咸豐5年（1855）成形，實與咸豐3年（1853）的漳泉械鬥、咸豐4年（1854）的福建小刀會竄擾基隆事件攸關。但漳泉械鬥在咸豐9-10年（1859-1860）仍舊發生，是故作者認為「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」應是戰後強調族群融合而形成的論述。另外，日治時期11姓輪值制度擴大成同姓宗族認同，也強化「金基貂石」地緣認同範疇，遲至民國36年（1947）才納入基隆其他外姓輪值。

第五章〈普度中的競賽：基隆主普壇的演變與發展〉指出昭和3年（1928）由地方士紳、慶安宮、市役所協議出資，在高砂公園內建立永久主普壇，消弭每年建築工事之耗。該壇於隔年落成後，輪值各姓皆利用此壇外觀裝飾或增加副壇的方式相互競逐。戰後主普壇因受戰火波及，於民國40年（1951）重修，民國63年（1974）遷建中正公園。

第六章〈地方領袖與民間社會：基隆中元祭裡的許梓桑〉以許梓桑為例，描述其具有慶安宮管理人、同風會會長、地方領袖等多重身分，並憑一己之力承擔經濟力衰退的許姓主普重責，主導普度活動項目改良與祭典之節約。

第七章〈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：日治時期的基隆中元祭〉論及日治時期基隆中元祭活動由於具備商業性的因素，除了吸引除宗親會外，日、臺人工商團體、新式社團等亦參與其中。至於行政部門雖有節約、衛生等考量而提出改革與限制，但也提供交通運輸的配套措施，顯示節慶文化空間已呈現跨族群、階級的多

重接觸與交流。

在結論的部分，作者認為本書探究、分析基隆中元祭的圖像形塑，與清代、日治時期的歷史事實建構之不同歷程，應可作為公共歷史學的參考例證。

三、綜合評述

全書雖由作者已發表的單篇論文集結而成，在章節安排方面，採取「以今思古」的方式由戰後追溯至清、日治時期，以戰後基隆中元祭相關論述為起點，進而就論述內容之史實加以考證，不僅反映作者對本書問題意識緣起、當代宗教文化現象的關懷，也足見其深厚的筆力和歷史學的考證功夫。至若利用宗親會主普資料、報紙資料、民間出版品，輔以口述訪問、田野調查，重建黃姓宗親會參與中元節慶的運作實態，並清晰梳理姓氏輪值制度、祭典成員組成、動員模式，則提供思索地方菁英「文化權力網絡」重要的代表性個案。

本書論述核心為基隆中元祭制度流變、地方菁英如何參與慶典及其背後動員組織運作，雖然作者未將本書置於傳統民間宗教研究的範疇，但此研究課題亦是現今學界研究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的重要命題。是故，本書對基隆中元祭的論證，不只釐清基隆地方節慶的相關疑問，此個案研究也對既有如祭祀圈、象徵資本等研究範式，有其貢獻與值得關注之處。首先，利用詳實史料，在官方、民間疊加的敘事中，細緻論證節慶源流、祭典制度轉變，也建構節慶背後人群動員及其網絡關係、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變化，並突破祭祀圈研究僅能靜態性描繪人群組成和信仰空間研究侷限，將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納進時間的縱度。第二，描繪日治時期中元祭時，作者論證宗親組織、工商團體等地方菁英之所以積極參與，主要是緣於商業因素的考量。此論點補充了過往地方菁英參與公共事務是為取得「象徵資本」的既定論述。

第三，在日治時期慶典活動人員的分析上，作者並未遵循殖民者、被統治者或日、臺人的分析框架，而是討論傳統宗親、廟宇組織、工商團體與行政部門、基隆同風會等新式社團複雜交織的人群分布，揭示漢人地方領袖間彼此競爭、合作，及受日本殖民者約束或協助等多元運作之情形。第四，本書援引「公共歷史學」理論，開闢另一研究蹊徑，其影響值得後續注意。

儘管本書有上述特色值得推介，但仍有些許須加以商榷之處，茲爰述如下：

(一) 作者在第三章指出黃姓宗親會之成立，乃是因應 1920 年代開始修譜建祠風氣，而非為參與中元祭（頁 121-122）。雖然作者亦指出新興姓氏可藉由參與水燈、花車展現自身的社會地位，然而筆者認為這畢竟與進入中元祭典核心內壇慶安宮、外壇四大柱（又以主普壇最為重要）制度有所區別，只有掌務內、外壇才能真正融入地方社會文化權力網絡。若以此觀之，11 姓輪值由宗親會掌握主普壇祭祀，因此黃姓若欲加入主普壇，成立宗親會乃是先決條件之一。

(二) 第四章指出慶安宮與中元祭關係密切，不僅是祭典內壇，也是基隆地區信仰重心。⁵ 作者引用昭和 17 年（1942）一位筆名牽牛子的觀察家對慶安宮的描述（頁 191），並認為此史料代表日治末期基隆地方人士對中元祭與慶安宮的看法。這份資料說明 11 姓將神像寄放在慶安宮，於每年農曆 7 月 24 等連續三日舉行義民普度。筆者認為這暗示輪值制度最初可能是以神明會的形式展開，或可回答作者對宗親會成立之前，如何組織、動員之疑問（頁 300）。如果從清領至日治的輪值制度，是歷經從神明會演變至宗親會的過程，則其轉變因素為何？筆者懷疑宗親會成立，是為突破地緣限制、擴大血緣網絡及凝聚財力，以支應輪值費用支出。⁶ 轉成宗親會後的人群，是否也持續利用陣頭、神明會形式參與慶安宮祭典？這是必須延伸討論之課題。

(三) 談及日治時期普度活動，主普壇輪值以 11 姓為主體，而其它主會、主醮、主壇三大柱則以推選人員負責，讓其他黃、周等新興姓氏也參與其中（頁 227）。筆者認為此現象顯示，日治時期基隆中元祭已整合兩個時代、不同的地方群體。在日治時期 11 姓中，許、謝等姓雖已中衰，主普制度仍排除新興姓氏，因此只能透過參與三大柱的籌備，進入中元祭的核心。作者提出戰後外壇祭祀只

⁵ 作者可能因篇幅、主題考量，並未對慶安宮的歷史源流有過多著墨。關於慶安宮與基隆地方社會，可參見作者另一著作：吳蕙芳，〈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：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〉，收於劉石吉、王儀君、林慶勳主編，《海洋文化論集》（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，2010），頁 317-352。

⁶ 筆者是透過第三章、第六章黃姓、許姓成立宗親會過程的觀察。第三章指出丁亥年（2007）黃姓輪值的贊助，主要是北臺灣黃姓宗親捐款。第六章昭和 2 年（1927）許姓宗親會創立之初，招募的會員涵蓋北臺灣，昭和 5 年（1930）宗親會解散，將剩餘會費八百六十六圓三十四錢留作明年輪值主普之費用。這兩個例子說明宗親會成員招募不僅突破地緣限制，擴及至北臺灣，也反映宗親會支應普度的經費來源之擴張。參見吳蕙芳，《基隆中元祭：史實、記憶與傳說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3），頁 149、305-306。

有主普壇留下，是因為姓氏輪值制度的關係（頁228）。若從整合角度觀之，戰後新興姓氏得以用「雜姓會」形式輪值主普，也是造成原具接納新群體的三大柱消失的原因之一。

（四）第六章敘述明治36年（1903）許梓桑由住持王六轉管理人手中接任慶安宮管理人一職，其因為王氏涉及不法變賣廟產被居民驅趕（頁315）。但直接制度性的因素為明治31年（1898），殖民當局設立寺廟管理人制度之故。⁷

（五）第七章指出行政部門因治安、交通、衛生等諸多考量，一面對中元祭典提出改革、限制，另外也利用公權力協助維持秩序、照顧老幼，更對節慶活動提供增加班次的交通運輸、燃放煙火助興（頁379-394）。筆者同意本書對於行政部門在祭典活動扮演角色的觀察，可是以報紙資料為主的論證恐流於片段，不易掌握行政部門對祭典態度的時間性變化，特別是1920年代官方本身對民間信仰活動舉辦存在振興經濟、節約浪費的矛盾，⁸這是否會影響中元祭的舉行？同風會對中元祭的改革？乃至於太平洋戰爭末期，在官方禁止的前提下，改在內壇慶安宮舉行慰靈祭，又是歷經何等地方菁英與行政部門之間的拉鋸？以上諸問題，可能礙於史料侷限或個人關懷因素，未能有更深入探討。

（六）作者在結論指出，經詳實歷史考證下修正的基隆中元祭圖像，藉此作為專業歷史知識應用在公共事務之例證，並強調公共歷史學與學院歷史學有密切合作之必要與重要性（頁437）。事實上作者在結論以外的篇章，較少與公共史學概念對話，殊為可惜。公共歷史學於1970年代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環境史家 Robert Kelley 所提倡，強調將史學知識和史學技能運用在學術研究之外，甚至是公共事務之中。⁹此觀點是本書作為公共歷史學依據的基礎，但公共歷史學從1970年代開始發展日益蓬勃，定義趨於多元，應用也擴及教學範疇外，¹⁰

⁷ 鄭螢憶，〈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信仰：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為例〉，《臺灣風物》59:3（2009年9月），頁27-60；林佩欣，〈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（1895-1919）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，2002）。

⁸ 鄭螢憶，〈破除陋習：日治時期臺灣社會「金銀紙焚燒」的風俗改革〉，收於川島真、松永正義、陳翠蓮主編，《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》（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123-154。

⁹ Robert Kelley, "Public History: Its Origins, Nature, and Prospects," *The Public Historian* 1: 1 (Autumn 1978), pp. 16-28.

¹⁰ 王希，〈誰擁有歷史：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、發展與挑戰〉，《歷史研究》2010:3，頁34-47。〔按：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，不另列出版年月〕。

不少研究開始關注群眾集體記憶如何在公共領域（public places）呈顯，藉此討論公共論述形成或當代社會公共議題，提供思索公共歷史學研究方法的重要個案。¹¹

若以此觀點切入，本書其他章節仍有與公共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對話空間，可供作者著力之處。例如，第二章討論中元節祭典論述形成，未能點出公共歷史學（學術調查、方志編修者）與地方史論述之結合；第五章討論基隆主普壇演變與發展，可關注民眾意識對新、舊主普壇建立是否轉變，乃至戰後新建主普壇建築結構如何彰顯、承襲原本既有傳統，是否來自各方不同文化意識角力？亦即大眾（宗親會、官方代表、歷史專業研究者等）所形成的公共論述與意識，如何反映在新、舊主普壇結構的轉變、延續。關於此點，Christa Williford 梳理學者以何種形式修復伊麗莎白公共劇院重建的研究，值得作者參酌。¹²

（七）本書陳述內容豐富且多元，難免有所疏漏。例如，作者指出輪值主普壇的 11 姓之中，只有許姓完全不涉入三大柱任何事務，卻在同處又指出明治 35 年（1902）許梓桑曾在陳姓輪值主普時，任三大柱之一的負責人。雖然此次祭典後來因疫情嚴重，並未舉行，卻也證實許姓曾參與三大柱的籌備。筆者認為作者的看法，應是受到統計資料集中於大正 14 年（1925）至昭和 11 年（1936）侷限所致。¹³ 另外，本書認為基隆同風會在昭和 10 年（1935）提出廢除焚燒金銀紙，為全島各地首倡。¹⁴ 事實上，自 1920 年代開始，因為殖民當局與臺灣社會運動者的提倡，已有些許寺廟開始廢除焚燒金銀紙的習俗。¹⁵

總而言之，本書雖有上述筆者提出的疑點，但仍具高度可讀性，本書不只考訂基隆中元祭史實，在研究方法、視角與史料的蒐集與論證，對後進研究者都有提點之效，可說是此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。

¹¹ 這方面論著可參見 David Glassberg, *Sense of History: 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American Life* (Amherst: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, 2001); Robert J. Cook, *Troubled Commemoration: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entennial, 1961-1965* (Baton Rouge: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, 2007).

¹² Christa Williford, 〈The Historiography of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ench Theatre〉, 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62 (2005 年 5 月), 頁 47-70。

¹³ 吳蕙芳,《基隆中元祭：史實、記憶與傳說》, 頁 311-312。

¹⁴ 吳蕙芳,《基隆中元祭：史實、記憶與傳說》, 頁 338。

¹⁵ 鄭瑩憶,〈破除陋習：日治時期臺灣社會「金銀紙焚燒」的風俗改革〉, 頁 151。

引用書目

Williford, Christa

- 2005 〈The Historiography of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ench Theatre〉,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62: 47-70。

王 希

- 2010 〈誰擁有歷史：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、發展與挑戰〉,《歷史研究》3: 34-47。

吳蕙芳

- 2010 〈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：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〉,收於劉石吉、王儀君、林慶勳主編,《海洋文化論集》,頁 317-352。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。
- 2013 《基隆中元祭：史實、記憶與傳說》。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。

岡田謙

- 1938 〈臺灣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圈〉,《民族學研究》4(1): 1-22。

林佩欣

- 2002 〈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(1895-1919)〉。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。

林美容

- 1986 〈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〉,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62: 53-114。

康 豹 (Katz, Paul R.)

- 1997 〈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〉,《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》53: 71-78。
- 1997 〈新莊地藏庵的大眾爺崇拜〉,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》16: 123-159。

張 珣

- 2002 〈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〉,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》58: 78-111。

鄭瑩憶

- 2009 〈臺灣總督府與民間信仰：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為例〉,《臺灣風物》59(3): 27-60。
- 2011 〈破除陋習：日治時期臺灣社會「金銀紙焚燒」的風俗改革〉,收於川島真、松永正義、陳翠蓮主編,《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》,頁 123-154。新北：稻鄉出版社。

謝國興

- 2010 〈南瀛地區廟會的繞境模式：兼論祭祀圈、信仰圈與交陪境〉,收於戴文鋒主編,《南瀛歷史、社會與文化II》,頁 235-254。臺南：臺南縣政府。

Cook, Robert J.

- 2007 *Troubled Commemoration: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entennial, 1961-1965*. Baton Rouge: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.

Glassberg, David

- 2001 *Sense of History: 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American Life*. Amherst: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.

Kelley, Robert

- 1978 "Public History: Its Origins, Nature, and Prospects." *The Public Historian* 1(1): 16-28.